

坦桑尼亚的贫困状况、减贫策略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胡国勇¹, 路卓铭²

(1. 阜新市发改委, 辽宁 阜新 123000; 2.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尽管非洲减贫任重道远, 但作为新世纪新非洲的典型, 坦桑尼亚卓有成效的减贫工作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本文首先剖析了导致坦桑尼亚极端贫困的根本症结, 进而全面审视了它所采取的建设性减贫策略, 并针对我国新时期贫困问题和扶贫工作所呈现的新特征, 系统而战略地探讨了坦桑尼亚减贫经验对我国做好新时期扶贫工作的启示。

关键词: 贫困恶性循环; 相对贫困; 扶贫式开发; 村级瞄准; 能力扶贫

中图分类号: F1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40(2007)05-0056-05

一、坦桑尼亚的贫困现状及症结剖析

坦桑尼亚位于非洲东部, 面积 94.5 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 3500 万,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300 美元以下, 既是世界上 49 个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也是世界上 42 个重债穷国之一, 约 50% 的家庭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1]。问题绝不止于收入贫困本身, 收入低下更是引发了坦桑尼亚人的人类贫困和能力贫困, 从而增加了坦桑尼亚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和治理难度。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坦桑的极端贫困? 坦桑人的懒惰和国家不当的发展政策固然难辞其咎, 但对政局相对长期稳定的坦桑尼亚而言, 以下因素无疑也是问题不可忽视的深层症结。

1. 经济发展问题: 发展严重不足造成的“整体性贫困”

从经济发展和历史推演的角度看, 大体上可以将贫困划分为因发展不足所造成的“整体性”性贫困与经济繁荣后因被边缘化所导致的“边缘化贫困”两种。如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大面积、长时期贫困就是因发展水平低而产生的国家整体性贫困, 而改革开放后一些“老、少、边、穷”地区, 由于自然、历史、经济和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原因, 仍处于贫困状态, 则为“边缘化贫困”^[2]。可见, 尽管“整体性贫困”和“边缘化贫困”的深

层原因都是发展不足, 但有质的区别, 前者对应的是发展的严重整体性不足, 后者对应的则是经济整体大发展前提下的发展局部不平衡问题。坦桑尼亚的极端贫困问题, 实质上就是发展问题, 是经济发展严重不足带来了国家的“整体性贫困”。最新减贫理论也认为, 在不同发展阶段,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在减贫作用上的性质是不同的: 当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 经济增长是减贫的主要手段; 而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收入分配有替代经济增长成为减贫主要手段的趋势。

2. 中心外围问题: 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下的“贫困恶性循环”

贫困理论中最丰富的莫过于贫困成因理论, 发展至今, 贫困的成因理论明显划分为两大块: 贫困的单因素分析理论和贫困的系统分析理论。前者包括地理环境决定论、资源匮乏论、人口因素论、教育不足说、资本缺乏论等。后者则包括纳克斯的“贫穷的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赫尔斯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钱纳里的“发展模型理论”等。追问坦桑尼亚贫困问题的成因, 任何单因素分析的解释能力都是有限的, 必须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实际上, 今天非洲经济发展的低层次、结构单一等问题, 不仅西方长达五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当属罪魁祸首, 而且当今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及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潮流更

收稿日期: 2007-08-25

作者简介: 胡国勇 (1968-), 高级经济师, 辽宁省阜新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路卓铭 (1974-),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博士后, 河南省三门峡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使得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被边缘化,从而陷入了“低收入——低投入——低产出——低收入”的贫困恶性循环。

二、坦桑尼亚的主要减贫策略

1.建立经济特区,实施鼓励投资措施,推动了经济的长期平稳增长

尽管国际理论界对增长与减贫的关系争议颇多,莫衷一是,但正如《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的那样,“市场驱动的增长是减少贫困的中心内容”,“各个地区和国家在减少收入贫困和实现人类发展方面的不同绩效多半可以归因于经济增长的差异”。况且,联合国新千年目标的实现,在理论上也要求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非洲国家保持7%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实现减贫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持续增长的宏观经济。经济发展了,才能使政府用于各项减贫项目上的财政支出成为可能,减贫战略才能实施。对资源丰富但多未开发的坦桑尼亚来说,不是没有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潜力,而是如何把这种潜力激发出来。

坦桑尼亚不断深化的经济改革,尤其是能源部门和电信领域,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从而重塑了经济增长机制,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宏观外部环境。自上世纪80年代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别推出对非洲援助的结构调整计划以来,坦桑尼亚政府从实行自由主义政策导致民族和宗教等问题凸显使国家处于分裂边缘中吸取了教训,努力消除自由化的影响,推进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中心的经济改革,建立经济特区,实施鼓励投资措施,坦桑尼亚经济进入了平稳增长的时期^[3]。比如,2003和2004财政年度,坦桑尼亚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达到了6.2%和6.3%;并且据预测,由于国际经济形势良好,对内改革的效应初步显现,2005和2006年仍然可以保持这一发展速度。出口多样化取得进展,黄金、钻石等贵重矿物的勘探、开采和出口成绩斐然,为赚取外汇做出了重要贡献。坦桑成为非洲继南非和加纳之后的第三大黄金生产国。

2.将减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减贫战略正从面向调整转为面向发展

近年来,世界上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严峻事实,表明原有的国际援助模式未能发挥应有的效力,需要探索新的减贫模式。1999年9月,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召开的秋季年会上,为加强债务减免和减贫之间的联系,会议决定将受援国拟定的战略报告作为重债穷国获得援助资金的依据。同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贷款机制由原来的“加强的结构调整贷款”(ESAF)转为“减贫与增长贷款”(PRGF)。减贫

战略报告(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s,PRSPs,以下简称“战略报告”)的产生,宣告了结构调整计划历史使命的终结,且以其合理的内核及广泛的参与性,得到国际社会和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非洲各国政府的认同,现已成为大多数非洲国家减贫新战略^[4]。

由于坦桑尼亚把以减债和优惠贷款为目的的减贫战略列入国家发展的议事日程,符合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因此,对于坦桑尼亚来说,减贫战略报告不仅仅是应对国际发展援助的要求,而且被视为政府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反映了坦桑尼亚近、中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

3.不仅注重经济减贫,而且高度重视减少人类贫困和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反贫困战略的变迁源自于对贫困问题认识的深化,而对贫困问题的认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差别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学者和权威机构,一般都是从物质层面和经济学意义上理解贫困的。比如,汤森(Townsend)就认为,所谓贫困,是指“所有居民中那些缺乏获得各种食物、参加社会活动和最起码的生活和社交条件的资源的个人、家庭和群体”^[5]。世界银行在《198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贫困是指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在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6]。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贫困涉及的主要是经济范畴,侧重的是收入和消费水平。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给贫困下的定义与1980年相比,却有了明显的变化。该报告给贫困下的定义是指“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并指出和衡量生活水准不仅要考虑家庭的收入和人均支出,还要考虑那些属于社会福利的内容,如医疗卫生、预期寿命、识字能力以及公共货物或共同财产资源的获得情况,并用营养、预期寿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及入学率等指标,作为对以消费为基础衡量“贫困”的补充^[7]。随着人类对于贫困问题认识的深化,国际社会开始更加注重从人文发展的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困的程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人文贫困”(human poverty)的概念(国内一般称为人类贫困)。它不仅包括人均国民收入的因素,也包括人均寿命、卫生、教育和生活条件等因素。

与对贫困问题认识的深化以及经济发展环境的变迁相适应,减贫战略也相应进行了调整。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反贫困的重点由加大对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物质反贫,转向了经济反贫与减少人类贫困并重。在这一大背景下,坦桑尼亚当局也逐步认识到,强调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结构调整计划虽然为国家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但不能解决坦桑经济危机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更重要的是,该计划对改善人的教育、就业、卫生和健康等

生存条件关注不够,穷人未能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受益,享受调整改革的成果。近年来,坦桑尼亚开始高度重视反人类贫困和人力资本投资,将经济发展与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统筹安排,特别是在最近的减贫战略报告中,更是把卫生医疗与艾滋病防治、教育、安全用水、城乡发展确定为国家减贫战略中的重点^[9]。

4.改进扶贫资金及项目管理,开始重视贫困人口广泛参与国家减贫进程

国家减贫战略的顺利实施,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管理。它可以确保减贫资金使用透明性,保证有限的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使用。反之,公共部门低效率、腐败、浪费,都会导致资源不足,用于改善公共服务的减贫项目难以达到必要的水平和质量。坦桑尼亚政府已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正在加强良政建设;被非洲国家广为接受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其重点之一就是加强良政建设。

贫困人群不仅是减贫战略实施结果的被动受益者,而且应成为减贫过程中的主体和主导力量。穷人可以广泛参与减贫项目的设立、实施以及监督的评价,以促进减贫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减贫战略的可持续发展。各国的扶贫经验也充分表明,贫困人口的参与和意见表达,能够使减贫项目更具针对性和科学性,降低减贫计划的实施和监督成本,达到减贫的预期效果。坦桑尼亚近年来已经逐渐重视这一问题,开始在减贫对象的确定、减贫项目的决策及实施、减贫效果的评价等方面借鉴国际经验,更多地引导贫困人口参与。

5.强化国际合作减贫,高度重视国际援助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坦桑尼亚等非洲的苦难和赤贫,除内因外,也有深刻的殖民历史背景和当今日益加深的全球化趋势因素等外因,西方发达国家即使不是罪魁祸首,也确实难辞其咎。同时,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结成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彼此间的联系犹如链条般不可分割、环环相扣。从这一点来说,非洲贫困也不符合世界的根本利益。因而,开展国际合作,以帮助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减贫和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西方发达国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外援既不是无条件的,更不是懈怠的理由。坦桑尼亚面对来势汹汹全球化潮流,一方面积极摆脱被裹胁淹没或挤向边缘的弱者命运,顺应时代,自强地搏击潮头;另一方面,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积极为国家减贫和经济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稳定、可持续的国际援助。发达国家对非洲的经济援助方式包括提供优惠贷款、减债、特殊的贸易政策、鼓励投资政策和发展援助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发展援助。坦桑尼

亚是一个重要的受援国。尽管世界对非洲援助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每年的 190 亿美元降到当前的 120 亿美元,但对坦桑的援助却十分稳定,每年将近 10 亿美元^[9]。归纳起来,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坦桑提供发展援助的目标一是要促进民主良政,二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三是保护环境。比如欧盟向坦桑尼亚提供援助的指导思想是:发展和巩固坦桑的民主与法制;帮助该国消除贫困,尤其要改善最贫困人群的生活状况;促进坦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重点是人力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促使坦桑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着重培育私营部门和发展贸易。稳定、可持续的国际援助对推动坦桑尼亚的经济增长、结构多元化和减贫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

三、我国新时期的贫困问题和扶贫工作特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要合理借鉴坦桑尼亚的减贫经济,必须要对两国国情差异和我国新时期扶贫形势有一个全面、科学的认识。中国在过去长达二十多年的扶贫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探索出了一条“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全面发展”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扶贫道路,取得了巨大的反贫困成绩,我国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未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数量)已经从 1978 年的 2.5 亿,下降到 2005 年的 2365 万,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由 30.7%下降到 2.5%。

但贫困和扶贫开发是动态的、有阶段性的,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的贫困问题和扶贫形势又发生了如下变化:

1.贫困线低和温饱效果不稳定,实际扶贫规模远大于贫困线下人口数量

确定贫困人口和扶贫对象,首先要科学界定贫困内涵并在此基础上给出贫困的具体测定标准。就我国的贫困标准来看,它实际上是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标准,是 1986 年由国家统计局按照维持人类基本生存所必需的食品支出(占 85%)和衣着、住房、燃料等非食品支出(占 15%)的比例,对 6.7 万户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的基础上计算得出的。当然,由于价格变动和基本生存必需品内容的变化,国家贫困线也是不断变化的,1978 年为人均纯收入 100 元,1985 年、1990 年、2000 年和 2004 年相应数字则分别为 206 元、300 元、635 元和 668 元。

相较而言,我国贫困线与 1 人 1 天 1 美元的国际社会通行标准要低。国家统计局于 2000 年对处于“温

^[9]《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是 2001 年 7 月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召开的第 37 届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它是非洲自主制定的第一个全面规划非洲。

饱线”以下的贫困人口的实际生活消费支出进行测算和研究后,建议把865元作为新的贫困线标准。按此标准计算,2005年为944元,相应的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就不是2365万人,而应该是6432万。但在实际扶贫工作中,因为很难完全按照统计标准界定清楚贫困人口,扶持的范围更大一些,约有1亿人左右^[10]。当然,实际扶贫人口数量与贫困人口数量不相称也和如下因素有关: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的群众,由于生产生活条件尚未得到根本改变,他们的温饱还不稳定,巩固温饱成果的任务仍很艰巨。

2. 扶贫对象更加复杂,减贫难度加大

进入新时期,贫困人口规模在大幅度减少的同时,一是“大分散、小集中”的区域性分布特征仍很明显,主要分布在中西部一些偏僻的贫困村庄(这些地方或者资源禀赋差或者尚未开发或者自然条件恶劣);二是呈现出很强的集团性特征^[11],即贫困人口主要由一些农民、下岗工人、残疾人、少数民族等特殊贫困群体所组成。因而当前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解决的难度很大。对剩余贫困人口,学界一般称之为极贫人口或真性贫困人口,而扶贫工作者则形象地将之比喻为“最难啃的硬骨头”。

3. 贫困人口在市场经济中更加弱势,相对贫困矛盾显现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贫困人口由于受到区位条件、自身素质、组织化程度等方面的因素制约,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发展地位。全球一体化更是加重了这一趋势。以1985年、2000年和2004年三年为例,贫困农民收入上限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水平的差距分别为1:1.9(206:398元)、1:3.6(625:2253元)和1:4.4(668:2936元)。农村基尼系数也在不断扩大:1978-1985年,为0.2124-0.2267;1986-1992年,为0.3142-0.3134;1993-2000年,为0.3292-0.3536;2001-2004年,为0.3603-0.3692^[11]。

四、坦桑尼亚减贫经验对我国新时期扶贫工作的启示

1. 继续坚持以发展促扶贫:从开发式扶贫到扶贫式开发

在一个经济体尚未高度成熟之前,发展永远是扶贫最好的方式,只是在发展战略与扶贫战略的结合上要因应形势做出相应的调整:当一个国家处于整体性贫困或者国内贫困呈“大分散、大集中”特征时,作为国家整体性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重要组成部分的开发式扶贫无疑是当然之选;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当一国贫困状况呈现局部

性、边缘化或者“大分散、小集中”特征时,要够得上国家整体性经济发展意义已显勉强而更彰显微调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意义的扶贫式开发就成为题中应有之旨。

坦桑尼亚处于发展初期,工业化刚起步,因而它旨在通过经济发展减贫的战略实际上就是开发式扶贫的战略。我国自1986年以来,包括1994年扶贫攻坚战略制定以来,实际上一直运用的也是开发式扶贫战略。但进入新世纪后,贫困形势和扶贫局面变化了,就要求我们在扶贫战略上进行调整。但这种调整不是根本性的,不是讲扶贫而不讲发展了,更不是只讲收入分配式扶贫不讲发展式扶贫了,而是仍然要将扶贫与发展相结合,只是结合的程度变了,由国家扶贫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几乎完全重合变为部分重合。

2. 要提高扶贫式开发的瞄准精度:从县级瞄准到村级瞄准

与坦桑处于发展初期,贫困问题普遍而严重,因而在扶贫战略上只能粗瞄准不同,我国新时期扶贫式开发要求精瞄准。新时期中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一部分贫困乡、村,呈“大分散、小集中”状态。只有抓住这些贫困村,才能解决绝大多数贫困人口的问题。为适应新阶段贫困人口的分布特点,有利于瞄准扶贫目标群体和增加扶贫工作的针对性,就应该提高扶贫的瞄准精度,彻底跨出原来以县为主体划定扶贫对象的做法,既要瞄准贫困县里贫困人口集中的乡镇和村,又要瞄准非贫困县里贫困人口集中的乡镇和村。这样才能做到真扶贫,扶真贫。

3. 新时期扶贫内涵的转变:从单纯经济扶贫到经济扶贫、能力扶贫并重

从贫困类型来看,有收入贫困、人类贫困;相应地,从反贫困对策来看,也有经济扶贫和社会事业扶贫:前者讲“造血能力”,后者涉及社会服务均等化;通过教育、医疗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不仅能提高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质量,而且有助于提高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即能力建设。

坦桑尼亚近年来开始高度重视反人类贫困和人力资本投资,将经济发展与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统筹安排。这就启示我们,在新时期要做好扶贫工作,不仅要针对贫困区域进行扶贫式经济开发,而且还要针对贫困人口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即做好能力扶贫。换言之,就是要改变过去单纯面向贫困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式扶贫,同时侧重对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源开发”,通过推动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训来提高贫困人口适应市场的能力和通过成功的人口迁移来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能力。

4. 新时期扶贫方式的转变:从单纯政府主导到强

化贫困人口参与

在我国扶贫实践中, 由于过分强调政府的主导, 缺乏贫困人口必要的参与, 使得扶贫在形式上演化为政府包办。其后果是: 一方面, 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将扶贫资金当作自己可动用的财力来源, 容易带来扶贫资金的非项目化渗漏, 甚至挪作他用, 降低扶贫效果; 另一方面, 扶贫过程中没有把贫困人口当作扶贫中最重要的力量看待, 而是把他们当作被动的接受者, 农户参与程度低, 这无疑会影响贫困人口参与扶贫过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坦桑尼亚的经验告诉我们: 贫困人群不仅是减贫战略实施结果的被动受益者, 而且应成为减贫过程中的主体和主导力量。贫困人口的参与和意见表达, 能够使减贫项目更具针对性和科学性, 降低减贫计划的实施和监督成本, 达到减贫的预期效果。在今后的扶贫工作中, 应考虑提升贫困人口的参与程度。比如穷人可以广泛参与减贫对象的确定、减贫项目的设立、实施与监督, 以促进减贫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减贫战略的可持续发展。再比如, 在扶贫开发规划和计划制定过程中, 可广泛推行参与式规划或计划, 由贫困人口、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技术和社会经济专家共同参与制订。

5.新时期扶贫主体转变: 从单纯政府扶贫到国际合作扶贫和社会多方扶贫

坦桑尼亚的经验表现, 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提供的不仅仅是优惠贷款和发展援助, 而是还有成熟的扶

贫理念、系统的扶贫项目动作能力和高效、灵活的扶贫策略。我国贫困线下的人口虽有限, 但实际需要帮扶的贫困人口却数量众多, 有必要积极与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等国际组织、机构和西方发达国家在扶贫问题上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和深化合作。

另外, 在新形势下, 鼓励私营部门和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 借鉴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方面的成功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 也有助于提高我国扶贫开发的整体效益。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社会中已经有一个相当大的高收入人群, 以非政府组织来动员这个人群, 为低收入弱势群体状况的改善出钱出力,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 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扶贫过程中通常采用由农民自己的组织和专业性的民间机构来负责的模式, 为了提高政府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 我国政府也应当着手探索采用竞争性的扶贫资源使用方式, 使更多的非政府组织成为由政府资助的扶贫项目的操作者。扶贫部门的职责则是根据非政府组织的业绩和信誉把资源交给最有效率的组织来运用, 并对其进行评估。

* 本文写作过程中, 国家扶贫办党组成员、财务规划司司长、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任张磊老师在数据提供和观点形成上给予了很大帮助和指导, 在此表示特别感谢!

参考文献:

[1]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0 年年报[M].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0.

[2] 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4 [J].转轨中的中国城市贫困(2003), 社科出版社.

[3] 无华.桑戈谈非洲和坦桑发展问题[J].西亚非洲, 2002(4).

[4] 安春英: 非洲脱贫战略的演进——减贫战略报告[J].西亚非洲, 2005, (1).

[5] LUCIA HAMMER,GERRISHON LKIARA,WATTER EALTER EBERLEI,CAROLYN ABONG.Are PRSPs Making a Difference? [A].The African Experience: Kenya[C].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2003- 03(21).2.

[6] 世界银行.1980 年世界发展报告 [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0.

[7] 世界银行.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 [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 张磊: 中国实施“ 一体两翼 ”扶贫战略情况介绍 [R].内部资料, 2005,(12).

[8] TIM WILLIAMSON,SUDHARSHAN CANAGARAJAH.Is There a Place for Virtual Poverty Funds in Pro- Poor Public Spending Reform? [A].Lessons from Uganda's PAF[C].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03, 21(4).

[9] 熊志勇.发达国家对非洲的援助——以坦桑尼亚为例[J].西亚非洲, 2003,(1).

[10] 张磊: 中国扶贫的回顾与展望[R].内部资料, 2006,(6).

[11] 张磊: 中国实施“ 一体两翼 ”扶贫战略情况介绍[R].内部资料, 2005,(12).

[责任编辑: 黄晓伟]